

“大家谈”丛书

来新夏谈书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大家谈”丛书

来 新 夏 谈 书

南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新夏谈书 / 来新夏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8

(“大家谈”丛书)

ISBN 978-7-310-03537-3

I. ①来… II. ①来…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67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17.625 印张 4 插页 213 千字

定价: 4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藏书·读书·治学

(代序)

(一)

藏书是关乎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问题,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发轫点。宋朝藏书家晁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此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当然藏书之功尚不仅于此,其更重要之作用乃在于保存、传递一国、一民族之文化,使之世代相传弗替,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当然是指私藏而言。“藏书”既已成为专用名词,则藏书的事实当已较为普遍了。

中国最早的正式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它与公藏、私藏,并成中国藏书事业的三大系统,而私藏则历来备受学者注意。私藏与私学兴起有关,私学的兴盛使图书开始由官藏传人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到处发表政见以取悦国君,因而需要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在各国游说失败后回家,受到冷遇,于是“陈篋数十”,发奋读书,说明苏秦有几十箱私藏;名学家



惠施有简书五车,成为“学富五车”成语的原始。自此以后,历朝学者几乎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中国的私藏事业一直贯穿着“仁人爱物”的精神,虽然以藏为主,但不少藏家都愿意藏书为人所用。如东汉的蔡邕因爱王粲之才而举私藏相赠。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晋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这种慷慨借阅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不少藏书家头脑中。明末有一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持一种“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态度。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当然在当代,我们的仁人精神已不是局限于“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而是“当与天下人共之”的气概。清末绍兴人徐树兰父子建古越藏书楼,出家藏向社会公开借阅,开藏书楼走向现代图书馆的先声。至于对书的“爱物”,从汉以来就有文献可稽。汉代已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篋)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有一个名曹仓的人修了一个石窟藏书,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他对图书的爱物之心,却极为后世所称道。如《旧唐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多种图书储存设备。明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防火、防蠹、防潮和防散失都有相应的措施。有的学者为了访求有价值的书,不惜纡尊降贵,亲到书市去搜寻图书,如清初的王士禛就按期在书市出没,把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作为私藏保护起来。正是由于我国对图书有这样一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善于保护图书文献的一个国家。

清朝学者多好藏书,但在认识上却有藏书家藏书与读书家藏书之分。如钱曾、黄丕烈以倭宋,即专一注重宋版书为藏书的宗旨,视书如古董。孙从添则以藏书为个人癖好,用做鉴赏。这些似非藏书正道。更有以藏书作市易以谋生者,则更无足与论了。我



认为只有读书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藏书家。清代中叶江阴有一位藏书家名承应韶者，藏书极丰，“广求佳本，必依次读终卷”，这是为读书而藏书的藏书家。另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对藏书与读书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读书。

(二)

读书是藏书的主要目的，而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为治学。但并不是所有读书的人都做学问。有人读书只为消遣和享受，一目十行，匆匆而过，凭自己的兴趣，愿看就看，甚至废寝忘食地看；不爱看则或加浏览，或翻不数页就掩卷而眠。这些人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烟云过目，一纵即逝，最多留下点模糊“书影”而已。另一种人很明白怎样读书，也知道如何读书才能有得；但只进不出，吞噬着别人的成果，以填塞自己的知识空白。这类人既不像牛那样，吃草出奶，也不像春蚕那样，啮食桑叶而吐丝不止，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类人可能博览群书，不使旁人受益，还自鸣为述而不作。这类人不是怕别人看透自己腹笥深浅的懦夫，便是自私者、守财奴。明明是掠取前人的精神财富，偏偏要深藏不露，自以为独得之秘，不愿有益社会，宁肯烂在肚里，最终与自己共化灰烬。我鄙视这两种人，却敬重另一类读书人。他们不放弃吮吸一切可取的知识，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焚膏继晷地反复咀嚼，像蜜蜂酿蜜一样，创造出有用的知识，贡献自己的成果，济世利人；其中更有一些人，甚至把读书方法和窍门都毫无保留地对后学倾囊相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真正读书人。



谈到读书,必须先知道读什么书。当然要读好书,但也不能采取封闭性的态度,而应比较广泛地读书。不要视离经叛道之作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成为新道学先生,而应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吮吸精华,排除糟粕。这样的长期积累,读书必能有得。对于反面的图书,只要能善于分辨,又何所畏惧?如果这部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能得到某些启示。至于对那些低级、鄙俗,甚至淫秽下流的书,还是节约点生命为好,不作无谓的牺牲。读书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务得,而要不断回味咀嚼,创造新知识。

凡读书要先读序或前言,这一点常被人忽略,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而必须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书的序或前言是严肃的作者对全书写作缘起、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为让读者对自己的著作有一种轮廓性了解。当你读完作者的序或前言,你就会抓住全书的纲。至于他人所写的序,有的人严肃认真地写序,对全书进行评论,则应一读以帮助对本书的阅读与理解。而某些捧场敷衍的序则大可弃置若粪土,无须为之消耗精力。其次是从头到尾地读一下目录,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一位负责任的作者所写的目录,往往是各篇章的提要。读了这些再去读全书,就比较容易通贯了。

在通读全书时,不要羡慕古人所说的“一目十行”,那是“英雄欺人”的骗人鬼话。读书不要一掠而过,而应该“十目一行”地去读,即全神贯注地认真阅读,养成一种“好学”的学习态度。这是读书的基本出发点。努力多读些书叫“博观”。“博观”是为扩大知识面的基础。但是,仅仅“好学”与“博观”是不够的,而是要再经过“深思”来“约取”才行。如果不把“博观约取”与“好学深思”紧密结合好,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如果把二者结合得好,那就为做学问提供了广袤的用武之地了。



(三)

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资料，做有益于社会的学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治学”。“治学”不是读几天书就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积累过程。在积累过程中，既会有“目轮火暴，肩山石压”的苦状，也会有“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的乐趣。但在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检阅所得，往往感到所积累的资料有许多是无用而嗒然若失，甚至认为自己干了蠢事。实际不然，因为当初在读书中所积累的资料绝对认为是有用的，只是由于现在眼光水平有所提高，所以才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因为有了这些“无用”的基础，才能锻炼出抉取“有用”的能力，而且这些“无用”是否真的“无用”，也许是水平所限，未能看出其“有用”的内涵，也许虽不能当正面材料用，还可用做旁证或背景材料，所以在“治学”的起始，应审慎地对待“无用”。

在“治学”上，务必要尽量求读原著。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有位学术前辈曾告戒我说：“‘采铜于山’与‘废铜铸钱’确是亭林不磨之论。但难被放言空论者所接受，甚或被嗤为舍近求远。”他还说：“挑水者，用桶从源源不断的河里挑水，用完再挑，水无穷尽；倒水者，则由别人从河里挑来的水桶中倒水，虽云轻而易举，但倒水时洒一些，势所难免，一如资料一转再转而走样。一旦别人之桶空，则不知别人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只能‘望桶兴叹’，继而环顾四周，是否有挑好水之水桶等人来倒，如一生中只知倒别人桶内的现成水喝，而不论清水浑水，只要是水就行，其后果实不忍设想。”我静聆教诲，不禁叹服前辈功底之厚、见解之深，能以浅近语言阐明深刻至理。

治学的基本点是勤奋与坚韧。勤的要求是四勤：勤听、勤读、



勤思和勤写,而其根本在勤读。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输入,方能逐渐走向专精。在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即所谓“致疑”。有疑就要不断寻根究底,即所谓“勤思”。疑而后思,思而后得。思而不得,就一面再去涉猎,一面就要勤问勤听,不仅要听前辈、同辈的高见,更要听后辈的新说。只要有一得之见,就要吸取,一字可以为师。四勤的最后是落实到“勤写”。“勤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比较难,特别在青年时期,常因贪多求快,自恃记忆力强而忽略记写资料与思想,但岁月推移,读书所得的痕迹日见淡薄,似是而非,终而等于白读。如果随读随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一文章仓库,随时取用,得心应手,由片段成整篇,由多篇成专著。这不仅是积累,而且还是一种磨砺。一般情况下,勤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但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遇到点挫折与逆境,往往消沉、颓废、懒散、嗟叹,以致把一二十年的岁月都在无形中蹉跎和荒废掉而追悔莫及。越是挫折,越应该以韧相待而勤读多读,一以解挫折的抑郁,一以充实腹笥,等待“用世”的机遇。

治学要冷而不能燥,冷能冷静地搜集资料,构思撰写,不是闹哄哄地赶时髦,发高论,迎世媚俗,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这正是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所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真谛所在。成文之后,也不要急于发表,因为这时最容易昏头昏脑地自我陶醉,而应先冷处理。请水平比自己高的、与自己水平不相上下的以及稍逊于自己的三类人看,集思广益,然后冷静下来,反反复复地思考、修改,直到定稿。待文章或著作问世后,更不能热气腾腾,不可一切,而要冷冷地听取意见,增订纠谬。如此,才有可能慢慢地走近大学问家的座位。

(四)

最近几年,我对藏书、读书与治学诸问题曾写过一些片段小



文,也常和一些年轻朋友谈过这些方面的内容。为了把我对这些方面关系的看法和想法连贯成一体,遂从小文和谈话记录中摘引部分资料,草成本文,以表述个人的见解,那就是:藏书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而藏,而主要的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至于治学,必须要恪守“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的规则。这些见解,纯为愚者一得,仅供参考。是否有当,至祈指正。

目 录

藏书·读书·治学(代序) 001

卷上 藏 书

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 003

藏书文化交谈录 009

藏书的聚散 015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 020

明清藏书家的藏用理论 025

天一明珠话沧桑 030

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036

常熟藏书首脉望 045

汗竹斋及其主人 048

扫叶山房谈往录 050

池北书库与王士禛 052

古越藏书楼百年祭

——记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 056

徐家汇藏书楼 066

海宁藏书家浅析 068

刘承干与嘉业堂 078

日藏汉籍与黎庶昌 090

天津藏书家陶湘 093

以“破伦”精神来藏书 095

袁寒云和宋版书 098

也说岛田翰的才与德 100

一部有价值的藏书志

——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 105

书厄 108

我的书缘 112

我与古旧书 116

卷下 读 书

闲话读书 123

读书十谈 132

读书散忆 137

杂书不可不读 141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

——为王世伟《历史文献研究》作序 143

和中学生谈读书 145

《史记选》今昔琐议 147

读《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151

《中国旧志历史文献分类专集》序言 157

读《中国文献学资料通检》 159

清人别集的价值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序 163

读《2000年中国最佳随笔》 167

吹尽黄沙始见金——读清人笔记 176

《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序 180

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著

——读《戴名世年谱》 183

一个参与中国政治的外国人

——读窦坤的《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188

出自圈外人之手的史学奇葩——读《大三国演记》 192

读《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196

留取丹心照汗青

——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200

他们不仅仅是淘书

——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有感 206

幕僚史研究的特异之作——题伍立场《烽火智囊》 210

期待美的历史——读《文化的江山》 212

气冲剑匣 笔扫游魂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中文本序 218

暑天的阴凉——读张阿泉《慢慢读,欣赏啊》 224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序 227

文如其人——为《籍海拾零》序 231

袁逸《书色斑斓》序 234

《易学通论》后记 239

《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整理本前言 243

我对二轮修志的一些看法 247

新志评说 251

后记 267

卷上 藏 书

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

中国藏书家的出现很早，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孔子应该是最早有私家藏书的藏书家，他以私人讲学活动打破了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状态，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孔子为了教育学生，准备教材，便搜集文献，进行“删诗书，定礼乐”的整理工作，自然地形成了私家藏书。同时由于列国诸侯争雄，需要各种不同学识的人才而争相罗致，所以就有各种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除了孔子的儒家外，还有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等，都各以其学术，培养不同类型的“士”。这些“士”为了猎取利禄，游说各国国君，急需充实自己的学识，因而也藏有一部分书。苏秦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他第一次周游列国，失败回家，遭到家人的鄙视，于是他不顾一切冷遇，“陈筐数十”，发愤再读书，终于获得成功，为六国之相。这不正说明苏秦已有几十箱藏书吗？另外有一位辩论家惠施，学识渊博，善于论说，当时人都知道他有五车藏书。五车的计量是指简书，固然不如现代书籍量大，但在简书时代，学识也很可观。所以后人称赞他人有学问时，就引这“学富五车”的故事。藏书这一名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的《喻



老篇》，文章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批驳他人论点时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可见藏书在当时已非个别现象。

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私家藏书一直与官藏成并驾齐驱的两大渠道，特别是从唐朝开始有雕版印书以后，得书较易，于是私家藏书的人数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细。唐朝藏书万卷以上的已有十五六人。宋明以来，私家藏书日益发展，万卷以上已非个别，清朝的私家藏书达到鼎盛时期，据一种统计，著名藏书家已近五百人，为历来藏书家总数的一半，而这些藏书家的文化素质又都相当高。

纵观历代藏书家的文化心态，确乎有一种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都珍惜和善待民族文化的传统，视保护民族文化为己任，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的图书。秦始皇焚书时，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儒生，就曾把儒家经典藏于夹壁墙中，保存了先秦文化，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壁藏书。这也表明了民间藏书这一文化现象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才感叹地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两汉之际，社会动乱不已，若干富有藏书的士人，多带着藏书，隐居山林，保护图书免遭损失。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进行了“采求缺文，补缀漏逸”的搜集图书工作。于是许多士人多“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使许多文献获存于世。宋代的私家藏书，在前此千年的藏书经验基础上，形成藏书家覆盖地域广，有代代相传的世代藏书家。藏书家一般都是官僚兼学问家，有财力和学识。藏书家有互相交流书目，传录图书，加快文化流通等特色。明代藏书家祁承燾，家中本来富有藏书，不幸火灾，藏书几乎全毁，但他决不放弃，重新搜集传抄，达十余万卷，超过原藏，成为明代晚期一大藏书家，起到了积极保存民族文化典籍的作用。清代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和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而且利用他们掌握的目录、版本、校勘、考证等专业知识整理藏书，完善藏书，在藏书事业中做出了